

亞洲與世界社叢書 5

中共的
社會主義
是什麼？

趙先運 / 著



亞洲與世界社

亞洲與世界社叢書⑤

亞洲與世界社叢書⑤

中共的 社會主義 是什麼？

趙先運

江蘇工業學院圖書館
藏書章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亞洲與世界社叢書 ⑤

中共的社會主義是什麼？

作 者 趙 先 運
出 版 者 亞洲與世界社
地 址 台北市光復南路一〇二號華視大樓十樓
電 話 七七二〇五五一～二
郵撥號碼 〇七三八七三八～九
打字印刷 英杰企業有限公司
地 址 台北市復興南路二段 293 之 3 號十樓之 1
電 話 七三二一二三四
封面設計 黃 冷 冷
初 版 中華民國七十七年七月
登 記 證 新聞局台誌字第一五六八號

新台幣四〇〇元

序言

社會主義學說林林總總，諸子百家；中共的社會主義宗屬於馬列社會主義這一家；這原是它自己從不諱言而舉世亦皆深信不疑的事實。問題發生於鄧小平從一九七九年開始改革中共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引用了原被一般認為資本主義的事物。自此以來，「中共的社會主義是什麼？」便成爲各方關心此一問題的人們議論紛紜的問題。我們將於全文的討論中，對此問題試提一項自以爲是接近事實的答案。中共的經濟體制改革正在深入發展，於嚐試錯誤中探索前進；此項改革姓「資」、姓「社」，在中共內部便有不同意見，而鄧小平們則一貫堅稱他們的改革是堅持和發展馬列社會主義。因此，在此處必須首先聲明的是：如果我們研究所得的結論，與他們自我宣告者恰巧相同，那是基於我們的見解，毫無贊同或支持其對抗反對者批評的意思；反之，如果我們研究所得的結論，與他們自我宣告者恰巧相反，那也是基於我們的見解，毫無贊同或支持其反對者認爲「鄧小平全面背叛馬克思主義」論點的用心。中共政權建立三十八年來，對其「當權派」的路線政策姓「社」姓「資」問題的爭論，糾

纏鬥爭，已經至少長達二十年以上；作爲一個中國人，我們寧願鄧小平們及早全部、徹底拋棄馬列社會主義。

馬列社會主義作爲社會主義思想的一個派別，它的理論與其他社會主義派別的理論相比較，基本不同之處，並不像馬克思、恩格斯和他們的黨徒武斷自我封贈所謂它是「科學的」，而其他派別的理论則全部或者是「空想的」，或者是「反動的」，而在於馬、恩和共產黨徒，始終認爲社會主義只是通往他們所標榜的那個最後目標即共產主義社會的道路。「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在他們那裡，其本身都具有兩面性，既是社會主義道路上各個階段的目的，也是爲走向共產主義社會而準備條件。既然作爲一條道路，它在此道路之任何階段決策，自然也具有兩面性：既是階段追求的目標，也是終將拋棄的對象。整個社會主義時期，也就如列寧所說：「不能不是死亡着的資本主義與生長着的共產主義彼此鬥爭的時期，換句話說，就是已經被打敗但還未被消滅的資本主義與已經誕生但還非常脆弱的共產主義彼此鬥爭的時期」。因此，探討「中共的社會主義是什麼？」首先應該引用這一「過渡理論」作爲評鑑的尺度。

其次，從實踐說：任何共黨都是先奪取政權，然後憑著專政的武器，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建立政權是他們社會主義革命的開始，而不是勝利和完成，中共也不能例外。按照它自己的說法，其一九四九年十月建立政權三十八年以來的歷史劃分爲四個時期，並認爲每一個時期都是在社會主義道路上朝前跨進一大步。概括言之：除最初七年以外，其餘恰巧分割成三個十年。最初七年它從新民主主義社會跨進社會主義社會的大門。在繼後的第一個十年中，它會冀圖一鼓作氣「跑步進入共產主義」，但因犯「極左的嚴重錯誤」而遭到理所當然的失

敗；在第二個十年中，它「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但到毛澤東一九七六年九月死亡爲止，始終不再侈言要用多少年的時間「過渡」到共產主義；在第三個十年中，鄧小平領導改革毛澤東從蘇聯照搬過來而又提高、發展的「斯達林式社會主義」，標榜「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由此可見貫串中共政權卅八年歷史的一條紅線，始終都是馬列主義關於「過渡時期」的理論；而其具體表現則是它相應於每一時期而先後提出的三條「總路線」。其一是毛澤東於一九五二年十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中首次提出，到一九五四年九月經「第一屆人大第一次會議」通過並載入中共第一部「憲法」的「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總路線」，它把中共帶進社會主義的大門；另一是一九五八年五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制訂的「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總路線」，它掀起向共產主義進軍的高潮而招致慘痛失敗的惡果；再一是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的「黨在新時期的政治任務」，它重新規定中共進行「作爲共產主義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建設」的主要目標，到「十三大」更進一步發展而成中共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三條「總路線」大致可以描繪毛澤東在社會主義道路上一鼓作氣、再而衰，和鄧小平繼起而進行第三次探索的軌跡。在此歷史事實背景下，提出「中共的社會主義是什麼？」這一命題，就研究對象言，便是鄧小平所謂「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就研究目的言，則是要究明這一「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什麼？

再從研究方法考慮，當然有各種理論架構可供選用，但是基於研究者個人知識結構的不同，對於研究方法的選擇，也就難免有其個人的偏好。見於要瞭解中共的現在，必須先瞭解它的過去，而結合它的過去和現在亦或可能較爲有效的展望其未來，因之我們認爲要解答「中共的社會主義是什麼？」最好是採用歷史研究法。另一方面又因爲唯物辯證法是共產黨人

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認識和掌握社會主要矛盾以主導社會發展方向又是他們決策的基本思維模式；而剖析「中共的社會主義是什麼？」在某種意義上，也正是綜合整理其改革的事象以還原於其決策的基點，因此，順藤摸瓜，最爲便捷的途徑便不妨兼採它所用的方法。

唯物辯證法認爲一切事物都是矛盾統一體；中共的社會主義自然不能例外，而沿用列寧關於「社會主義時期」的定義，更有理由認爲社會主義社會是「已被打敗但還沒有滅亡的資本主義」與「已經誕生但還非常脆弱的共產主義」這一對矛盾的統一體，換言之也就是「社會主義事物」與「非社會主義事物」的矛盾統一體。在這一對矛盾中，按照中共邏輯，「社會主義事物」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決定社會發展的方向；「非社會主義事物」是矛盾的次要方面，終歸要走社會主義道路。中共政權三十八年來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曲折歷程，一句話說完，實即是中共的「社會主義事物」同大陸人民的「非社會主義事物」競存互鬥、此伏彼起的具體表現；沿著這一線索探討「中共的社會主義是什麼？」，應能獲得較爲接近事實的答案。

最後概述章節架構的設計，共分兩部分。第一部分探討中共社會主義經濟的建構及其與非社會主義經濟互爲消長的關係；旨在究明中共經濟體制改革的意義。第二部分探討中共對其在社會主義道路上所處里程位置的再認識，社會主要矛盾的再認定，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再調整；旨在通觀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輪廓，「合二爲一」大致可以說明「中共的社會主義是什麼？」

作者簡介

趙先運，安徽宿縣人，一九三〇年生。從一九六三年開始從事共黨問題研究與教學工作，著、譯甚豐。最近十多年來，先後於中美、中日、中韓等國際學術會議，發表中共「評毛」、「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對外開放」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與實際」等論文，獲得廣泛的肯定與好評。本書為其一九八七年在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所提碩士論文之中，有關中共體制改革實際的兩章；成於中共「十三大」召開之前三個月，而所提論點皆為「十三大」所證明。

目 錄

序 言

第一篇 社會主義經濟與非社會主義經濟 …………… 一

第一章 社會主義經濟的建構 …………… 三

第二章 非社會主義經濟的回潮 …………… 四七

第三章 體制改革與馬列社會主義 …………… 七七

第二篇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 一五七

第一章 航程座標位置的認定 …………… 一五九

第二章 社會主要矛盾的認定 …………… 一九一

第三章 上、下層建築的調整 …………… 二〇七

第四章 路線權力鬥爭的發展 …………… 二二九

第三篇 結 論 …………… 二五五

第一篇 社會主義經濟與 非社會主義經濟

「無產階級專政是建成社會主義經濟的工具」（註一）；共產黨人一般都以取得國家政權作為它們走上馬列社會主義道路的起點，而中共自稱它較其他共黨政權多有一個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資產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易位互換，「資本主義道路」和「社會主義道路」的調軌轉轍，便是「社會主義革命」的本質內容。循此線索研究「今日世界所有共黨政權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際，可以看出它們都是先行建構其「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而後纔憑藉這種專政的暴力，建構「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從這一基點出發，探討中共社會主義經濟同大陸人民非社會主義經濟三十八年來互為消長的關係，便是研究「中共社會主義是什麼？」首先必須解答的問題。

陳雲曾用「非社會主義經濟成分」一詞，泛指「資本主義工商業和個體農業、手工業」（註二）；但此一詞語所涵蓋的範圍，應該尚不止此。中共「政協共同綱領」所規定其經濟制度包括的「五種經濟成分」中，除「國營經濟」一項被肯定為「社會主義經濟」之外，其

餘四種：「合作社經濟」只被承認是半社會主義經濟；「國家資本與私人資本合作的經濟」則被說是「國家資本主義經濟」；「農業和手工業者的個體經濟」和「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當然如陳雲所言，都是「非社會主義經濟」。中共近年對其早期經濟成分的說法，較之「政協共同綱領」略有不同，它指述其政權建立之初存在的「五種經濟成分」是：全民所有制經濟、集體所有制經濟、公私合營經濟、私營經濟和個體經濟（註三）；其中「全民」和「集體」二者都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另三者則是「非社會主義經濟」。

另如前所已言，中共自謂其曾經歷一個「新民主主義」的過渡時期，並稱「五種經濟成分」併存是它的「新民主主義經濟制度」，而這「制度」的本質內容因之就是「社會主義經濟」與「非社會主義經濟」的「矛盾統一」。而從「新民主主義經濟向社會主義經濟過渡，即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內容，便是確立社會主義經濟的統治地位和進步消滅非社會主義經濟」。

第一章 社會主義經濟的建構

研究中共「社會主義經濟」的建構問題，可以分別從它的內容和形式兩個方面來考量：「內容」指謂它的「根本制度」即「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指謂它的「結構體制」即社會生產的「組織形式」。中共政權建立卅八年來，它的「經濟制度」和「經濟體制」雖有多次的調整和改革，但是它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絕對領導地位一經建立，便只有「體制改革」以維持、鞏固和加強的問題，而不再有什麼「改革」的問題，其歷史的「經濟體制改革」，或者是爲着擴大和提高其「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範圍和程度；或者是爲着維持和鞏固這一根本制度；或者是爲着搞活其社會主義經濟和提高其社會主義的社會生產力；而提高社會生產力，在一定的意義上，也是爲着維持和鞏固它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治制度」。

概括言之，在其「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即「所有制」的總體結構方面：中共政權建立初期按所有制劃分的五種經濟成分；「社會主義經濟」與「非社會主義經濟」隨着中共在馬列

社會主義道路上的探索前進，即中共「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各自在其「國民經濟」中所佔的比重，發生顯著的昇沉變化：

一九五二年，毛澤東提出「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總路線」；當年在其「國民收入」的比重中，全民所有制經濟為百分之十九點一，集體所有制經濟為百分之一點五，公私合營經濟為百分之六點九，個體經濟為百分之七十一點八。一九五六年，中共宣告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次年，一九五七年，在中共的「國民收入」中，全民所有制經濟上升到百分之二十三點二，集體所有制上升到百分之五十六點四，合營經濟上升到百分之七點六，個體經濟下降到百分之二點八，私營經濟所佔比重已經微不足道。

一九六六年九月即在「文革」第一年，停止對原資本家支付「定息」，「公私合營企業完成了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而「國家資本主義經濟」也就歸於消亡。

一九六五年即「文革」前一年，各種經濟成分在「工業總產值」中所佔的比重，全民所有制工業佔百分之九十點一，集體所有制工業佔百分之九點九。公私合營工業、私營工業、個體工業項目下，已無統計資料。一九七八年即鄧小平進行經濟體制改革前一年，在中共的工業總產值中，全民所有制工業佔百分之八十點八，集體所有制工業佔百分之十九點二（註四）。反映在中共「十年文革」和「二年徘徊」時期，它的「全民所有制工業」生產實績逐年下降；集體所有制工業所佔比例逐年上升。這種情況，一方面可能是「文革」期間，普遍推廣「五小工業」，集體所有制工業數量增加的結果；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全民所有制工業遭受「文革」衝擊，經濟效益普遍下降的影響。

一九八〇年是鄧小平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的第二年，在中共工農業總產值之中，全民

所有制經濟佔百分之六十點三，集體所有制經濟佔百分之三十四點六。同時出現兩種經濟成分，一是「全民所有制經濟與集體所有制經濟的合營經濟」；它顯然不同於五十年代一度存在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但也不能完全等同於「全民所有制經濟」。二是復活的「個體經濟」和其他新的經濟成分，包括「全民與私人合營、中外合營、華僑和港澳工商業者合營、外資獨營等工業」（註五）。一九八五年，各種經濟成分的工業在中共工業總產值台所佔的比重，全民所有制經濟佔百分之七十點四，集體所有制經濟佔百分之二十七點七，個體工業佔百分之零點四，其他類型經濟佔百分之一點五（註六）。「個體經濟」和其他類型經濟顯然都是「非社會主義經濟」；「非社會主義經濟」的再現，在中共「傳統」的意義上，可說是「新民主主義經濟」的復活，「社會主義經濟」的倒退；一九八一年，「紅旗」雜誌第一期所刊石仲泉的專文透露中共黨內也有人提出這種主張，但鄧派另有說詞，因而成爲中共黨內路線、政策分歧的「熱點」。

分析言之，中共建構其「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基本是照搬蘇聯斯達林模式；其形成和建立以來的演變，概可劃分成五個時期。

第一個時期，從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七年，是它「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初步形成和建立時期」，主要包括：

1. 「建立國營經濟爲領導、多種經濟形式併存的所有制結構」：一九五六年基本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後，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佔絕對優勢，乃在此基礎上，對「國營經濟」實行「統一計畫、分級管理」，並對「基本建設實行集中統一管理」。

2. 「建立國民經濟計畫管理體制」：一九五二年底成立「國家計畫委員會」，並自一九

五三年開始，不斷加強計畫管理工作，對整個經濟實行直接計畫與間接計畫相結合的計畫管理制度。

3. 「建立全國統一的財政體制」：一九五〇年統一財政收支，把財政收入的主要部分，集中至中央。一九五一年開始劃分中央、省、縣三級財政，實行「劃分收支，分級管理」的財政管理體制。

4. 「建立統一領導的交換體制」：統一內外貿易。一九五三年開始，全面實行計畫分配制度，物質由主管部門平衡分配；商業也實行統一領導、分級管理的體制。

5. 「建立以中央集中管理為主的勞動工資體制」：勞動就業實行統包統配；工資則對「國家機關」、企業、事業單位，全面實行統一的工資制度。

這種生產統一計畫，財政統收統支，物資統調統撥，商品統購統銷，外貿統進統出，和就業統包統配的「中央一統」經濟，到第一個五年計畫後期，就開始暴露出「集中過多，統得過死的弊病」（註七）。毛澤東首先於一九五六年四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論十大關係」的講話中，提出「中央和地方的關係也是一個矛盾」，並謂解決這個矛盾，「應當在鞏固中央統一領導的前提下，擴大一點地方的權力」，「不能像蘇聯那樣，把什麼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點機動權也沒有」（註八）；繼之，中共「國務院」於五月八月召開「全國體制會議」，討論當時中央集權過多問題，提出改進體制的「決議」草案，頒發討論，徵求各方面對於「改革方案」的意見。一九五七年十月，中共「八屆三中全會基本通過『關於改進工業管理體制的規定』」、「關於改進商業管理體制的規定」和「關於改進財政管理體制的規定」三個草案」，交由「人大常委會」照章通過後，以「國務院

「名義下達實施。這是中共「經濟體制改革的起步」（註九）。

一九五六年，一方面是中共對於生產資料私有制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跨上馬列社會主義道路，亦即照搬蘇俄斯達林經濟模式甫經完成的一年；另一方面也是中蘇共關係出現分歧的一年。此時，在蘇聯，斯達林已經死亡三年，赫魯曉夫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四日深夜至二十五日清晨，對俄共二十次黨大會秘密講話，批判斯達林個人崇拜；毛澤東因而遭受嚴重衝擊，加上其他原因，乃對蘇共鬧分裂。中共在斯達林統治「共黨帝國」時期，不敢不照搬蘇聯模式；斯達林偶像破碎後，乃試探修改斯達林模式；就「地區分類」的意義言，毛澤東於一九五六年進行「體制改革」這件事，也可說是中共探索其「中國式社會主義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開始。此事早於鄧小平一九八三年在中共「十二大」正式提出「走中國式社會主義道路」二十六年；其差別是中共當年還未能完全擺脫其為蘇共「兒子黨」的地位，因之也就不敢堂而皇之的提出口號，另樹一幟。

中共的「社會主義過渡時期」也是它黨內新起路線政策意見分歧的時期。據劉少奇在其為中共政權成立十週年而發表的專文中透露：在「農業合作化」問題上，中共黨內「有一種觀點，認為我們工業化水平還很低，還不能實現農業機械化，因此，要很快實行農業合作化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應該的」；「有一種觀點，認為迅速實現合作化，勢必降低農業生產」；「還有一種觀點，認為我們這樣迅速地實現農業合作化，會妨礙農民的團結，就是說，除了富農以外，富裕中農也會不滿甚至反對我們，而支持我們的將只有比較貧苦的農民」。在「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問題上，「有一種觀點，認為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只應當加以利用，而不應當加以限制和改造，或者說我們限制得過多，改造得太急了」；「有一種

觀點，認為我們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又是逐步改造，又是實行贖買，又給資產階級選舉權，又給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以一定的政治地位，「太妥協了」。在「生產資料所有制方面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後」，「社會主義革命」是否已經結束的問題上，「有人認為是結束了，再不需要進行任何革命了」。劉少奇指責這些觀點都是錯誤的，而稱道「過渡時期總路線是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同時並舉的總路線」；「是引導中國社會由當時的既有社會主義經濟、又有資本主義經濟、又有個體的複雜經濟結構，過渡到單一的社會主義經濟結構的路線」；並稱道毛澤東所制定的政策，「是完全適合中國條件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好政策」。根據劉奇的這一說法，則毛澤東在此一時期雖然是照搬蘇聯斯達林模式，但是在作法方面也照顧到「中國特點」；因之也可以說毛澤東早在二十多年前，便已為鄧小平創下「走中國式社會主義道路」的典型（註一〇）。斯達林肯定中共的「過渡時期總路線」，並在其親自指導編寫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中，專列一章（第四十二章），論述中共的「經濟制度」，並稱道它是為「建成社會主義社會創造條件」。

第二個時期，從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〇年，是中共「經濟體制改革的嘗試」時期（註十一）。改革的中心環節是擴大地方的權限，並配合「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進行了其他方面的改革。它的主要內容是：

1. 「把中央各部所屬企業下放地方管理」：一九五八年，中共「中央」政權所屬企業九千三百個，下放後保留一千二百個；下放企業佔原屬總數百分之八十八。「中央」直屬工業總產值由原佔整個工業總產值百分之三十九點七，下降為百分之十三點八。